

“创伤理论与事件诗学”读书会综述

为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提升学科素养，4月29日，我院以线上腾讯会议的形式举办了“创伤理论与事件诗学”读书会。院长韩伟教授、文艺学专业教师王敏教授、赵周宽副教授做点评指导，文学类研究生参会。

读书会以高建平主编的《外国美学：第34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收录的4篇以创伤理论与事件诗学为主题的理论文献为主，扩展到对具体文本创伤书写的探讨。本次读书会由王敏老师主持，分成14:30-17:00，18:30-21:00两个时间段进行，14位硕士研究生依次进行读书汇报。

“创伤理论与事件诗学”读书会内容一览表

分类	论文题目	汇报人
创伤理论与文学现代性	《创伤的尺度与“现代性创伤”》	高渊圆
	《创伤理论与文学现代性》	桂钰
	《文学创伤理论的修正式理解》	罗怀日
	《走向“平庸”的创伤应该如何复现》	韩洁
创伤事件的文学疗愈	《创伤理论研究》	陈颖
	《从创伤到事件——创伤事件的内涵构造与理论形态》	闫哲
	《创伤性知识与文学研究——兼谈〈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中的创伤书写》	赵雪
	《创伤理论与文学研究》	向举妮
创伤理论视野下的文学书写	《创伤理论视阈下〈战地情书〉解读》	陈若冰
	《退守、见证与复原：阿来〈云中记〉的创伤书写》	吴甜
	《创伤、经历与言说：〈被掩埋的巨人〉中的创伤书写》	高颖
	《读凯西·卡鲁斯〈创伤、经历与言说〉兼谈谈恩美小说中的创伤叙事》	党彬彬
	《〈鼠疫〉中的见证艺术》	李晨希
	《疗救、见证和建构——电视剧〈人世间〉的三重创伤》	蔡纯洁

一、伤理论与文学现代性

《创伤的尺度与现代性创伤》

高渊圆

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高渊圆分享的主题是《创伤的尺度与现代性创伤》，她以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作为切入点展开论述。梅洛-庞蒂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意识是在身体性经验中建立的。只有通过身体的感知，某物或某种现象才能成为我身体构筑世界的一部分。古典思想家“理性的人”观念确立的“人”的标准，让一种偏离需要重新被审视。创伤作为一种常态的偏离也同理。古典思想家对“完整的人”的定义是局限，只有正常文明的成年人才可以构成一种融贯完整的体系。悖论在于，这正常的成年人并不真正“拥有”这一融贯完整性，这是个不可能真正达到的理想或极限；所谓的正常人必须努力去理解各种所谓的不正常，因为没有人会永远真正地免于这些不正常。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理性的世界是未完成的，此文明和认识也并非是不可置疑的。

耶鲁学派学者杰弗里·哈特曼等人建立了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档案库，这种以“证词”形式呈现的“创伤的文学”作为一种亚文类，与大屠杀联系紧密。“证词”是一种并不完全客观的描述，他试图表达的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故事，是一个活人通过回忆、思考、哭泣等方式讲述出来的。哈特曼认为，“大屠杀传记的目标不是传达一种丰富且独特的个性，而是去描绘那个旨在于受害者心中制造出一种自我否定意识的非人性化与匿名化的过程。”而这正是一种对纳粹试图消灭其个体意识的反抗。创伤文学，作为一种理性罅隙间的叙事，也应该得到不那么极端的关注——现代性创伤。

19世纪至20世纪之时，资本主义实现了对世界空间的重新配置。19世纪之前的那种客观性、必然性和物体化的气氛全然消散，纯粹物质主义的空间经验已经不合时宜。纷乱滚动的现代意象不断地将“人”撕成碎片——一种新的空间结构，就伴随着现代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生成。现代社会空间的特质之一就是整体性的撕裂，这些碎片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却是“总体事件的结晶”——类似于蒙太奇式的星丛，它们并不被纳入一个整体中而彼此关联，它们的内核是历史学家所不屑的“历史垃圾”，它们在飞速的流动中汇聚成璀璨的印象之流，流散在现代城市空间的固定格式中。“在今天，这种时空的变化日趋严重，时空压缩的激进化趋势极大地消除了空间障碍，却使得自主的空间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城市的功能是规划的内在要求。这种规划，从哲学上来说，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的回声。现代性的分裂，其中之一就是人和自然的分裂。笛卡尔主义

对大规模的都市建造构成一种哲学鼓舞：人将一个粗暴秩序强加给地理，这是大势所趋。都市作为一个他者对象，就会变成一个人设计的条理清楚的空间布局。”人在追求”理性“，却永远完成。现代性的创伤让人彻底无法靠近一个完整的理性，即人永远远离了正常。

现代性的都市动荡打碎了一切固有的东西，一方面，广阔而密集的现代空间已经极难支撑身体经验的生长，工具理性挤压着人性的生长，人被程式化的、日复一日的重复流动所控制，身体退化为城市的零件，个体完全被同化。一方面，与乡村民俗社会的血缘纽带和邻里关系相异，城市工业机器的运转对个体具有高度密集而功能主义的社交要求，“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自我目的的手段”，但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使得人与人的无法实现真正的联结，个体的成为单子化的孤独存在。失去了内在性和丰富性的躯体，已经失去了识别和进入地方的能力。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错置关系的状态，这就是大规模的理性规划所带来的空间隔膜。于是出现了一种更为隐蔽而轻微的创伤——现代性创伤。最后，高渊圆同学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数字世代的今天，这种后现代的创伤怎样隐藏进了当下的生活？

赵周宽老师认为，高渊圆同学的分享提供了一种新的体系性解释：创伤性可以作为解释现代性的新维度，后现代创伤也是社会转型的表现，人的价值、完整性的体验遭到挑战。随后赵老师提出了问题：在后现代数字化时代中世界的整体性在丧失，而创伤理论为这种现代性解释提出了哪些关键点？高渊圆同学认为是对身体的理解和对理性的偏离两点。赵老师认为是完整性的丧失，即在后现代背景下狂妄与自大理性的失落，他的西方背景是其表层体现，而理性可能性的丧失导致对世界完整的表征造成困难才是现代性创伤的深层原因。韩院长指出本次读书会以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建构创伤理论的体系并提炼出方法论来指导对文学研究；高渊圆以不同时期对创伤的定义为线索，而如何将元宇宙、数字语境和创伤理论相结合，这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

《创伤理论与文学现代性》

桂钰

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桂钰发言题目是《创伤理论与文学现代性》，她指出“创伤”概念首先是心理学领域的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对象是一个或一组压倒性事件；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强迫式)重复性(形式)；第二、侵入性(对受创主体具有个人附着意义)；第三、延迟性(反应)——滞后的。未完成的。接下来介绍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种族性别创伤理论、

创伤文化理论这四种理论。

关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桂钰同学介绍了三部作品。一、《歇斯底里的病因》(1896)佛洛伊德提出“在所有歇斯底里病症背后都有一次或多次非成熟期的性经历事件，在儿童最早期发生的事件。”二、关于《悲悼与抑郁症》(1917)他讲到“受创的悲悼主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将爱从失去的客体转移到新的客体，顺利实现移情。”以及“受创的抑郁主体拒绝承认爱的客体之丧失，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长时间陷”还有“入自责、沮丧、冷漠等心理情感，排斥甚至拒绝心理移情。”三、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表达出“现代文明进程中充满了爱欲与死亡本能的对立冲突。”

关于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亚伯拉罕(Nicolas Abraham)、托罗克(Maria Torok)提出心力投入(introiection)和内并(incorporation)心理创伤：心力投入是通过与客体接触，将无意识包含在自我中的过程，内并心理创伤是爱的客体的缺失和外在世界的诡秘变异。维尼柯特(D. Winnicott)提出过渡客体理论：过渡客体在外在现实与内在心理之间形成潜能空间—连接心理想象客体与外在真实客体的经验领域。

接下来，关于(后殖民)种族创伤理论范农(Frantz Fanon)提倡从身体与历史/种族双重维度认知种族创伤：种族创伤之根源，是白人主导的文化强制(cultural imposition)及其逆向建构的白人的黑人恐惧症。文化心理殖民，通过“惩恶扬善”，达到心理征服和文化同化的目的。这不仅会改变被殖民者的心理愿景，同时深刻影响殖民者的精神世界，使被殖民者与殖民者都打上心理殖民的创伤烙印。关于创伤文化理论，18世纪末以来的历史是精神病学霸权话语不断强化的时代，是以沉默的疯癫和创伤为症候的文化时期。肖莎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提出了创伤文化的疑难：主要有三点：1. 象征性创伤事件与创伤认知(创伤体验与历史记忆)的矛盾；2. 创伤的沉默与文学的发声；3. 媒体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创伤的扭曲再现，压制了街道和本土话语。紧接着桂钰同学介绍了，文学创伤理论(literary trauma theory)，首先是创伤叙述与文学再现，文学叙述创伤有两种可能性：1. “不可进入性” 2. 文学想象可以预见创伤。

接下来她谈到创伤治疗的必要性——文学想象与创伤叙述：站在创伤幸存者的角度看，单纯谈论遭受经历要比感受其中的内心体验更加容易。比如鲁迅《祝福》祥林嫂，而范德科尔克也谈到“对于创伤幸存者而言，谈论自己遭受了什么比注意、感受并用语言表达他们内心体验的现实要容易得多。”最后介绍了创伤叙述的再现性、间接性、反思性这三个特点。“再现性”是对创伤经历和创伤情境的一个再现，“间接性”是指可以通过一些隐喻或象征的文学表达手法来表达对创伤事件的一个感受，“反思性”是对创伤行为背后根源的一个反思，这也是

最重要的一点。“反思性”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核，现代性就是指通过对过去历史的反思来建构对未来的希望和想象放在现代文学作家中来理解，比如鲁迅，他就可以通过批判封建社会以及封建礼教制度，表现对人的压抑和对人性的一种抹杀，宣扬了自由解放以及独立的观点，就符合现代性的含义，还有沈从文笔下构建了的湘西世界，就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是对现代发展社会的一种质疑和反思，发展过快的社会，对人性也会产生一种异化，从而消解了原先的世界的一些美好品质，那么这种现代性的反思也是同样符合。通过对创伤理论的发展的回顾，创伤理论逐渐关注到现代社会对人的创伤，说明了创伤是一个非常丰富和多元，并且不能被单一的概念所束缚的理论。

赵老师指出，桂钰将创伤理论形成的过程进行了一个总的梳理，从心理，文化到文学表达的历程都梳理的很清楚，但是要做我们的文学批评，可以思考创伤理论对于理解文学本质、文学起源、文学功用等方面的价值，如果能从这些具体的方向给出一个独特回答，对我们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会有很大帮助。第二，桂钰提到了三组矛盾，更重要的是文学如何能够化解这种矛盾，或者说文学如何可能表达创伤，又或者通过表达创伤达到一个疗治的可能，若这样表达就很具体了。创伤理论具有一个矛盾性，即体验的真实性和对体验表达的困难性，这个矛盾用日常语言或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就很难完整表达，这个时候创伤文学的兴盛就体现出文学语言和文学表达的独特性，从这个方面来研究，以创伤理论为一个引子来引导我们思考文学表达的特殊性。韩老师认为桂钰同学还需要增强研究的问题意识，如何找到创伤理论和文学的关联性，这才是重要的问题。学习西方理论不能只是知识的介绍，需要落地生根。

《文学创伤理论的修正式理解》

罗怀日

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罗怀日发言题目是《文学创伤理论的修正式理解》，首先他介绍了 Caruth 的创伤理论，对 Caruth 来说，创伤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以至于大脑无法正常处理它。Caruth 的创伤理论很大部分受弗洛伊德影响，但 Caruth 将她的文学理论与当代临床创伤专家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对创伤描述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健忘素质和难以言喻性——在这些理论家的作品中找到了类似。对 Caruth 来说，创伤经历是“无人认领的 (unclaimed)”。在创伤中，可怕的时刻以如此惊天动的力量到达，以至于它扰乱了大脑的功能，受害者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处理体验。创伤迫使自己隐藏起来，虽然感官流形不断“记录”视觉、声音、气味和感觉，但大脑无法对它们起作用。

其次介绍了 McNally 的研究，McNally 的核心论点是：创伤性健忘症是一个神话，虽然受害者可能选择不谈论他们的创伤，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不能。McNally 认为，受害者可能不会经常考虑他们遭受的创伤。从本质上讲，McNally 声称，创伤性健忘症的支持者将不愿考虑创伤与无法思考创伤混为一谈。他进一步表示，他的对手的说法基本上是无法支持的：“我们永远无法‘证明负面’——证明这个人的记忆中没有这些信息” McNally 还怀疑创伤记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说法。创伤不会阻止叙事记忆的形成。对创伤的记忆可以表达为对创伤提醒的生理反应，这并不排除它在叙事中表达。

接着讨论了 Joshua Pederson 的创伤理论。Joshua Pederson 首先回顾了 Caruth 概述的旧创伤理论的特点，同时确定其对 McNally 认为过时的创伤记忆模型的依赖。接下来，总结了 McNally 的研究，并指出了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 Caruth 的工作。第三，提出了一个基于 McNally 的文学创伤理论的新模式。最后，在阅读各种描绘创伤的现代作品时使用了这个新模式。首先，寻求在文学中造成创伤的批评者应该将注意力从文本中的空白转向文本本身；其次，创伤理论家应该寻找增强叙事细节的证据；第三，创伤理论家应该专注于描述时间、身体或本体论扭曲的经历。

最后进行的对于《广岛之恋》和 *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的文本分析，总结出结语：事实上，创造性语言，如讨论性语言，可以帮助愈合过程，Owen、O'Brien、Resnais 和 Duras 以及 Foer 的作品证明，艺术可以描绘康复、和解和康复——也许对于幸存的退伍军人来说，可以影响他们。因此，这些作品提醒我们，虽然文学可能不是表达创伤的唯一方式，但它仍然是收回我们最痛苦经历的斗争中的宝贵工具。

王敏老师认为罗怀日同学将创伤、记忆、叙事这三个关键词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谈到创伤叙事，我们就要对传统的叙事学有更多的了解，要通过和传统的对比，引发一些新的思考。赵周宽老师指出，罗怀日同学讲述的是 a 说了第一个观点，b 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然后 c 提出一个综合的观点，并且在这个综合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理论，用这个理论可以来分析作品，是这么一个思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你的观点和 abc 不一样，你发现了什么问题？可以在这样一个层面进一步思考。

《走向“平庸”的创伤应该如何复现》

韩 洁

韩洁同学的发言题目是《走向“平庸”的创伤应该如何复现》，她指出，对

于创伤问题（Trauma）的研究最初源自 19 世纪 70 年代的医学上对歇斯底里症（Hysteria）的研究，企图为这种精神疾病的治疗寻找到解决方案。然而随着对创伤心理的深入分析，创伤问题不仅成为了精神医学的研究对象，还引发了文学、哲学、政治等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注和探讨。20 世纪是一个充满社会灾难的世纪，是极权主义肆虐的世纪，20 世纪的人们经历和见证了种种人道灾难，人的精神世界伤痕累累，公共世界危机四伏，创伤理论的研究对象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着不同的意义内涵，面对永恒变化的社会意识和潜伏着的灾难危机，我们如何理解“创伤”？

首先“创伤”是什么？：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了“文化创伤”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并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韩洁归纳的创伤发展的四个阶段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种族/性别；创伤理论；创伤文化理论。

其次，作为逐步平庸化的创伤，首先什么是“平庸之恶”，1961 纳粹军官受审时汉娜·阿伦特提出“The Banality of Evil”，恶的平庸性，平庸不是指才能的庸碌，而是生活化理念的逐渐侵蚀，就当下而言即科学理性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观念的本质认同。雅斯贝尔斯：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看作神话般的存在，应当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而细菌只能是细菌。接着“恶的流溢”，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我们每个人、每个社会里都存在着恶。如果我们都是受害者，同时又都是行凶者，那么就没有一个观众能够冠冕堂皇地把自己从集体苦难的受害者或行凶者中抽离出来。”

最后，关于创伤记忆的复现，创伤事件复现的有三个阻碍：（一）受害者的内心“秘穴”；（二）加害者的遮蔽意愿；（三）创伤事件的平庸化。进步叙事：以一种“灾难被克服—光明结束”的结构，宣告了灾难已经被击败并从世界上消灭，而由此带来的精神创伤在新时代也终将被克服。悲剧叙事：第一步是将大屠杀独立出来，使其独特化，第二步则是要使其普遍化。悲剧叙事不同于进步叙事的乐观主义，进步叙事中大屠杀以正义之战为犹太人平反为结局，历史绕过了这个弯路最终回到正轨，被亚历山大称之为“出生创伤”（birth trauma）；而在悲剧叙事的过程中大屠杀的杀戮血腥的黑暗即是事件的终点，灾难无法经由任何手段得到修复，被亚历山大称为“死亡创伤”（death trauma）。

王敏老师指出，韩洁同学的思考很有见解，但是内容有点庞杂，创伤涉及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建议把这种创伤是如何被文学运用，把它和文学性联系在一起，把问题集中在这里，在这样的一个联系的过程中，那些关于别人的创伤的观点，可以作为上面的一些分支，凝聚在一个点去切入。韩

院长指出，韩洁同学还是做了一些前期的阅读工作的，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但是汇报应该紧紧围绕着这个题目来进行的，但需要进一步把问题具体化、系统化、逻辑化。赵周宽老师指出，韩洁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深刻，并且切中了核心，那这个核心是什么呢？可以看出韩洁确实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方向，将创伤理论做一个突发性的，一个巨大的心理，或者是伤害性的一个范畴，可以像一个更加日常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或者是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似乎不为人所觉察的一种创伤。在这样一种创伤理论上，方向也拓宽了。我们对创伤研究的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创伤，比如说大屠杀，911 等等突发的，这种突发性是可以解释的，在特殊情况，文学趋势，或者特殊行为的出现，都可以解释的。但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波澜。小小的感动，小小的挫折，对于这些的趋势，这是平庸的创伤可能反应的。我想我们能不能把日常性的平庸的创伤过程和具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伤形成一个关联。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想到了鲁迅的《伤逝》，看起来其实是关于爱的主题。看起来是个体的创伤，那同时，这个创伤又具有时代性。它是一个时代精神需要不断更新的发现，我觉得这这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的创伤。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的创伤和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的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创伤连接起来的一种文学趋势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创伤事件的文学疗愈

《创伤理论研究》

陈颖

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陈颖同学分享的题目是《创伤理论研究》，她主要从四方面创伤研究、文学证据论、回归人文阐释、记忆中的确定性四方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介绍了创伤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创伤”（trauma）最初主要指外在力量在身体上造成的物理性伤害，但经由夏科、弗洛伊德和拉康等人的阐发，该词现在更多是被用来指精神性伤害。19 世纪 60 年代，由于火车惊吓症的出现，人们开始更清楚地认识到创伤的存在。在此之后，女性歇斯底里症以及炮弹冲击症（shell shock）同样被纳入到这一范畴中。直到 1980 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颁布《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被正式收入词条。至此，创伤才被正式确认为一种疾病。导致创伤的可以是战争、灾难和暴力等重大事件，但生活中的变故、惊吓、疾病、挫折、亲人的故去，甚至被动物攻击等日常事件同样会带给个体创伤性体验。

第二部分讲到在西方的创伤研究领域中的美国耶鲁创伤研究学派，以弗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学为学理基础，又融入了文化记忆理论的相关理念，注重消化、吸收解构主义于精神分析学等经典文学理论资源，不断引领创伤研究向前推进和发展。代表人物有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凯西·卡鲁思(Cathy Caruth)等。苏珊娜·费尔曼在其著作《书写与疯癫》和《证据》中，反思了文学批评与心理分析之间的关系，并对文学批评理论的范式变革和教学实践做出了努力。在《书写与疯癫》一书中，费尔曼指出：“见证是一种表演行为，是文学极其重要的功能之一，事实上全部文学都或多或少、或主要或次要地以证据模式存在——对应于现实地的证据。”像巴尔扎克、福楼拜、亨利·詹姆斯等，这些作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像精神病学家一样来诊断社会现实，并将这种症候式的反应和深邃的洞见转变成文学知识。这也就是说文学与疯癫之间是构成性的关系，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见证被社会权力或知识话语所排除的疯癫。费尔曼还将那些融生活和文本于一体的文学文本称为生活证据，如回忆录、自传、信札等，因为它们承载了真实生活。既然文学书写行为是见证创伤事件的行为，那么证据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上、在不同层面上渗透了各种文学文本。文学读者的阅读行为实际上也是一个通过文学文本来间接见证创伤、体验创伤、接近历史真实的过程。

第三部分谈到，凯西·卡鲁思回归人文阐释，他将文学文本、心理分析文本和批评理论文本纳入理论阐释视野，建构了一种跨学科、历史阐述和创伤体验意义上的创伤理论，其所有关于创伤的理论思考和对创伤的体验式表征都以弗洛伊德的思考和表征为参照。卡鲁思提倡回到创伤的心理体验层面，在创伤、经历与言说》一文中卡鲁思指出创伤是：“对一个或一组压倒性事件(an overwhelming event or events)会有一种反应，这种反应有时是延迟性的，其形式是重复的、侵入性的缘起于事件的幻觉、梦、意念或行为表现。同时认为创伤言说存在内在的悖论，创伤不仅仅被沉默压制，同时更鲜明地表征为声音——与主体创伤对应的、不为创伤主体所认识 and 理解的、他者的声音。

第四部分讨论了记忆中的确定性，创伤诉说体提供了对创伤的理解、对创伤事件的回应和阐释，那么该如何判断创伤回忆的真实性？创伤回忆中的沉默、错误认知是否构成了创伤回忆的不可靠性？以劳布和费尔曼合著的《证言：文学、精神分析和历史中的见证危机》中的劳布在耶鲁大学进行犹太人大屠杀证词的口述实录工作著名案例举例，告诉我们回忆体验虽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也是一种真实的回忆方式，其真实性在于：虽然历史事件被留在了过去，但情感却成为过去仍然萦绕着现在的证据，证明了创伤事件的现在性，同时也说明了在创伤记忆中情感的确定性。

王敏老师进行了点评，认为陈颖同学从纯理论角度阐述了创伤与文学的关系。创伤事件后幸存者的不愿言说与听者的理解产生的偏差都可能造成伤害，这也体

现了现实与文学的差异性，而自传性经历如何成为文学性表达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韩伟院长也评价道：读书会分享最关键的是，要提炼出观点和问题，要将每个部分提炼出观点，才能再进行更加细致与深入研究

《从创伤到事件——创伤事件的内涵构造与理论形态》

闫哲

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闫哲发言题目是《从创伤到事件——创伤事件的内涵构造与理论形态》，他主要分享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创伤和事件的概念，第二部分为创伤何为事件。第一部分中他向我们介绍到创伤理论滥觞于西方悠久的构建记忆理论的传统，理论基础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当代以哈特曼、费尔曼、卡鲁斯为代表的耶鲁学派的推动下走向了创伤理论的多元构建。在源流发展上大致可以分为记忆理论时期滥觞期、精神分析学时期、当代创伤学派时期三个阶段。同时谈到事件理论，21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界呈现一个重要的转向，那就是认为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明确的对象，而且可以被看作一个言语行为、行动或者事件。这是对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对定义为“作品”的事件的反叛，也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新建构与思考。在文学化的事件中，事件得以绵延突变，取得长存的生命力；在事件化的文学中，文学的现实关涉力更加强烈，文学的力量也得以彰显。事件的转向，不可避免的提醒我们关于文学文化、历史政治、人类伦理等思维范式和研究模式的更新。

在第二部分创伤何以成为事件中，通过以上四个方面展开：

1. 创伤遭遇事件：创伤事件的奇异性，创伤是后创伤压力紊乱的简称。通常被描述为对没有预料的或强烈的暴力事件的回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并没有被完全理解，但事后它们又以反复再现（flash backs）、噩梦和其它的重复现象的形式回归。这是医学界乃至学术界对“创伤”一词的普遍定义。创伤意味着与一次重大的、足以改变命运的事件的正面遭遇。这一足以造成创伤的事件是出乎主体想象，行进于规则之外的。齐泽克在《事件》中认为：“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创伤作为事件独异性的特征表现有不可预测性、绝对唯一性以及不可承担性。

2. 创伤在场与事件返回：创伤事件的绵延性，弗洛伊德在研究歇斯底里症时发现了这种病症的重复性特征，他认为遭遇创伤后，一种强迫的重复性会不断地浮现，从而造成神经症。为了说明这种重复性特征，弗洛伊德借用了泰索的浪漫史诗《自由的耶路撒冷》中的故事。主人公误杀了自己的恋人，恋人的灵魂封存在一棵高大的树里，当主人公再次挥刀砍倒这棵树时，树干的创口流出了血，恋

人的声音也在不断谴责主人公对她的伤害。通过这个故事，弗洛伊德分析道：“在心理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迫性重复动作，它超越了快乐原则。”遭遇创伤就是重复性地返回创伤现场，这种返回是强制的，非自愿的。在与创伤事件一次次的直面冲撞中，受伤的潜意识似乎试图以这种方式得到修复，即卡鲁斯所言——“认领一段不被承认的经验”。也即瓦格纳在歌剧《帕西法尔》中“创伤只有造成它的矛才能治愈”的深刻实践。创伤遭遇的重复性回溯，与事件的绵延性特征在时间指涉上有了共同向度。事件不是单一方向的生成，而是既指向未来，又指向过去。以事件发生的那一瞬起，旧世界质变成了我们所陌生的新世界，我们的旧思维模式再也无法把控、理解这一事件。而创伤发生后，创伤以其事件性的强大力量，将时空指向了“发生时”和“发生后”两个维度。创伤性事件粗暴地遮蔽了发生前正常的、熟悉的、旧的世界。而将创伤者在“发生后”惊悸的生活中一次次地拉回“发生时”，遭遇又一次的伤害。德勒兹的事件概念是永远生成的。正如柏格森提出的界定时间本质性特征的绵延理论一样，事件或者说时间，都是永远的生成而非某种已经定型了的东西。创伤性记忆也是持续性，长久性，不可终止性的。如梦魇般折磨受伤者的余生。更加吊诡的是，伤口也会撕裂，生长出新的伤口组织。旧的创伤会在现实情境的长久接触下生出新的创伤。根据不同创伤造成的效果的强弱，新旧创伤的关系也分类为两种：（1）新创伤对旧创伤的再现与挪移：如典型文本《人间失格》；（2）新创伤与旧创伤的并置与合谋：如《活着》中，富贵亲人们并置性的死亡事件构成一个合谋的创伤事件，与富贵的求生意志进行了一场异常残酷的角力。

3. 创伤何以言说：事件中的言语之力，言语之于事件，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已有诸多学者进行阐释论述，意在肯定和突出言语的事件之力。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出语言分为记述话语和施事话语，后者在迫切的条件下可以生产现实。“我们通过话语施事行为这个术语而引进的东西，是所指，但它指涉的不是话语行为的结果，而是指涉与说出该话语时的特殊环境有关的话语施事语力量的约定。”这说明奥斯汀肯定了言语的力量，但将这一力量指向了产生言语的具体现实。德里达在一场“言说事件，这是否可能”为题的学术演讲中，德里达将奥斯汀言语之力从语境中解放出来，赋予言语以事件之力。认为言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事件，就在于它本质上可以成为一种“生产”，一种“转变”，一种“发明”，因为它最终实现了一种“转变”。言语之于创伤，也有着奇特的治愈与疗救效果。杰弗里·哈特曼关注词语与创伤的关系，在《论创伤性知识与文学研究》中认为：记忆的文学建构不是直白取回，而是另类形式的陈述。创伤理论将形象语言或诗意语言，或许可以说一般的符号过程，阐释为某种事物，而不是对先前经历的形象强化或重复性替代。医学界公认的对创伤的治疗，就要通过讲述出来（述说或

写作)来达到宣泄和平静,或通过催眠的方式再现创伤,从而缓和创伤危机。海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中认为个体的创伤可以通过向别人讲述的方式得到复原。她认为“讲故事的行为、在创伤回忆的反常过程中似乎有效果……由恐惧造成的躯体神经病可以通过说话的方式得到治疗。”讲故事,重现历史记忆等也就成为创伤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时下证词文学的兴起,不仅因为证词作为历史证据的功能性,另外也有减缓创伤影响的作用。受害者通过基于作证行为的倾诉与宣泄,精神创伤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拉卡普拉在《书写历史,书写创伤》中就专门从大屠杀的证词中来分析创伤的历史及受害者的精神世界。朗兹曼在电影《浩劫》中也在探索一种言说之于创伤的可能性。言说之于事件,是生产建构之力,是唤醒事件的钥匙。事件在言语中进行自我塑造、自我生产,而言语也在事件中获得交涉现实的能力。上帝在创世时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这是言语事件之力的最初呈现。而言说之于创伤,意味着缝合伤口的可能,锁闭心灵的敞开,以及与自己那段不被认领的创伤记忆的和解。

4 创伤何以疗治:作为事件的爱,《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创伤性书写中,作者的创伤经历得以言说,创伤郁结在言说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然而这部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仍然选择了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告别了创伤。可见,在巨大的创伤性事件面前,言语也会显出它的单薄与无力。因此,爱成为了疗救的最后希望。柏拉图《会饮》里,阿里斯托芬认为,人开始有三种性别:男人、女人、男女合体。但不管是谁,人都是圆的。他有四只手、四只脚、四个耳朵、一对生殖器。这样的圆形之人,非常强壮,也非常狂妄,他们要和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一比高低。宙斯为了惩罚他们,劈开了他们的圆形身体,使之一分为二。为了寻求原初的完整性,男女开始结合,而这合二为一,也就是柏拉图的爱。弗洛姆认为爱是一种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是克服孤独的方式。承认,而是让两个爱的结合者相互激发,让它们动态地盘旋式地上升,无限地上升,这样的结合甚至是没有终点的,或者说,爱的结合永远向一个更好的结合点进发。爱克服孤独而导向进步。

巴迪欧提出了真理的四个前提,即政治、科学、艺术,以及爱。对巴迪欧而言,爱就是一场纯粹的事件,爱是两种不可能序列下子集的集合,而这一集合意味着由爱生成的崭新的创基性产物,甚至爱自身也是一种创基性力量。如《圣经》里的亚当与夏娃。在奥斯维辛之后,阿甘本面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及其晚期阶段根本无力改变事件的结构性的轮回,将希望寄予爱的潜能,爱意味着毫无保留、无所顾忌地投身于奇遇和事件。阿甘本看来,潜能从存在论上不再依附非潜能,甚至比现实更加具有原初性。爱是人的纯粹潜能|非潜能,完全敞开自身进入事件,献身爱之奇遇,成为灾异事件之后的生存希望。爱不仅是引发崩塌性事件的“奇点”,也是治愈创伤最有效的手段。这种爱可以是爱人、亲人、友人间的具

体而现实的爱，也可以是形而上的创造潜能的事件之爱。虽然阿甘本的爱是弥撒亚式的理想主义，爱面临来势汹汹的灾难时也会显得无能为力。但爱的事件哲学，带着人性的光辉和诗性的智慧，为我们遭遇创伤时劈开了一条红海之路。

王敏老师点评道，闫哲的分享思路清晰，把创伤理论落在了实处，将创伤与事件联系在一起，而事件的言说又可以与文学相联系，最后找到了“爱”这个出口，逻辑自洽。韩伟院长补充评价道，闫哲同学积极和导师交流，在经过指导后才形成了较成熟的汇报内容。各位同学的汇报要形成理论文章，就要更加强化其理论逻辑，弱化文本分析和文学性的表达，事件与创伤的连接要更有机，最后的成果才能更有价值。赵周宽老师最后补充道，两种理论内在关联不能停留于表面，要寻找本质性关联。“爱—事件—创伤”是一个循环的逻辑，与陈若冰《战地情书》分析中提到的对创伤的疗愈又相互呼应。

《创伤性知识与文学研究—兼谈〈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中的创伤书写》

赵雪

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赵雪同学分享的题目是《创伤性知识与文学研究—兼谈〈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中的创伤书写》。首先，赵雪以上海大学李飞老师的研究课题“创伤理论研究”为线索，进行了对创伤理论的发展梳理。李飞将当代创伤研究置于3条学术脉络中，后解构创伤研究、批判性创伤研究、多元化创伤研究。并将卡鲁斯、费尔曼、解构派老将哈特曼以及受她们影响的相关研究称为“后解构创伤研究”，其理论主要依据PTSD话语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展开。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是一种保护层(同时是感觉和知觉的保护层)，它保护着无法暴露在外部刺激中的、有着外感受层的囊泡。卡鲁斯总结了意识保护层的两项功能：(1)将外部刺激安置在有序的时间体验中保护生物体；(2)进一步，“将世界维持为外部(out)”，使生物体保持基本的内外感受。而创伤刺穿了保护层的过度刺激，因此创伤意味着心灵能力在时间化自我经历区分内外两个层面的崩塌。创伤事件可以造成创伤幸存者在“时间划分的自我和外部世界”经历的断裂，导致创伤事件记忆的“滞后”，幸存者同时存在于两个现实，两个时间点上。创伤记忆与正常记忆从本质上讲无法融合，导致创伤受害者的“双重思维”，即身体精神和灵魂处于分离状态。杰弗里哈特曼总结了创伤性知识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一方面，创伤作为一种事件，表现为被记录在案的文字，另一方面，创伤作为一种真实的回忆，以一种修辞方式呈现在文学中，对事件进行了永久转义。由于创伤记忆的承载不同于普通的记忆，所以更需要文学书写的参与。因为内外

边界的崩溃，外部刺激直接写入心灵，所以在创伤情形中，直白性和不可进入性（无法指称）并存。正因如此，卡鲁斯将创伤视为“未被认领的经历”（unclaimed experience），受创者在其发生时，无法充分看到、经历到进而吸纳事件自然也就无法直接指称事件，接续了解构理论关于指称困境的议题。

在第二部分中，赵雪同学针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进行了创伤的书写分析，主要分为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两部分，而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呈现的这种对创伤的口述表达呈现出了一种复调特性。针对个体创伤的描述，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写到“我在寻觅深刻的话语，寻找生物意义上的人，而不仅仅是时间和思想意义上的人。”大众对于一些大型创伤时间的感受往往陷入程式化的困境，创伤被符号化，所以阿列克谢耶维奇坚持主张，再现创伤的权力只可赋予创伤的亲历者。关于集体性创伤经历如何描述，凯西卡鲁斯认为，“集体创伤是指对社会生活的基础肌理的一次打击。它损坏了联系人的纽带，损伤了之前人们的集体感。集体创伤缓慢的作用，甚至是不知不觉地嵌入那些遭受它的人们的意识中，所以它通常没有个体创伤感受的那种突然性，但仍然属于震惊的一种形式。”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中呈现的创伤不仅仅是一种我们能感知到的破坏性力量，更体现在创伤对个体与集体潜在行为模式的弥散性影响。她在作品中呈现了一种运用多人口述进行创伤描述的方式，这种方式展现了时间的延迟，而多人口述中体现不同的、反复的重复回忆也与创伤记忆的重复性特点相呼应，对角度的口述将碎片拼凑完整。这种多人感受的交织叠加成了一种复调，全方位再现了人对创伤的多角度认识，从而可以更充分的探求历史的真实性。作家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写作，不带任何评论，让口述者自主再现，赋予幸存者表达经验与感受的权力，而这种复调式的写作也可以使读者更真切的抵达创伤本身。

王敏老师认为，赵雪同学的优点抓住了创伤理论的跨学科特性，结合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等方向，如哈特曼提到的创伤书写是一种心理到文学的一种转义，而作品多人口述和复调性的两个终点需要做进一步的凝练和探讨，要找到对经典文本解读的独特路径。

《创伤理论与文学研究》

向举妮

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向举妮同学的《创伤理论与文学研究》由两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主要还是论述创伤理论的概念，即它的生成和内涵，第二部分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创伤理论如何运用到具体的作品分析中去。创伤研究的出现与历史语

境和意识形态背景有关。1990 年代前后冷战格局结束，在政治领域、公共领域以及大众文化中，20 世纪的历史灾难重新成为焦点。与 20 世纪历史灾难相关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论争频繁成为文化界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人文研究格外关注历史灾难及其创伤性后果。创伤研究的出现也有自身的学术史逻辑。首先，创伤话语从临床研究向人文研究的跨领域转移；其次，西方文论的内在危机及其“伦理转向”，卡鲁斯、费尔曼以创伤为支点促进了解构理论的“伦理转向”。费尔曼总结有关创伤的知识或源自创伤的知识是由两个因素组成。一个因素是创伤性事件，这个事件被注册在案而非被经历过。另一种因素是对这一事件的记忆，它绕过心灵或严重地分裂心灵，对事件进行永久性转义。“创伤”的最大特征在于，当创伤事件发生时，它具有一种逆转或打断的力量，一种突变的力量使一重意义被另一重意义所取代，强调偶然性以及断裂性。正如在奥斯维辛这个创伤性事件之后展开了一个新的诗学空间一样，由于“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异质性与同质性的突然打破），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断裂”，造成某种意义的突变，因此一种创伤性事件的生成往往提供给文学以开放性的言说空间。创伤事件的生成影响着有关文学的言说，因此由创伤理论切入作品，往往同时也包含着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的交叉，有助于更为宏观地考量作品的社会背景、时代心理以及特定的历史文化。

然后，向举妮同学分享了自己针对唐颖短篇小说《隔离带》的论文构思，论文标题为《唐颖〈隔离带〉的创伤书写路径》，《隔离带》的背景设置在 1998 年上海甲肝爆发的时期，男女主人公曾经由于甲肝病毒而被阻隔在医院的隔离带之外，“隔离带”不仅是他们婚姻的见证物，也成为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障碍，造成了一种心理的距离，最终导致了“我”与“丈夫”婚姻的破裂。由隔离带事件反映了出时代的创伤事件造成的个体之间的情感障碍问题。由时代的创伤入手表现个体创伤以展现大时代下的社会心理，显示了将创伤理论与社会学理论、文化记忆理论相结合进行文学批评的必可行性。论文的构思脉络是：首先，对创伤事件的发现，如何发现创伤事件？怎样处理创伤事件？其次，创伤事件后个体的心理转向，即创伤事件如何作用于个体心理或者如何对个体记忆进行篡改。最后是，个人与集体记忆的修通，对个体创伤记忆的挖掘也是一种群体创伤表征。

最后，向举妮同学分享了自己对当下的观察和思考：近期网络上涌现的“疫情文学”是抗疫背景下的产物，书写着特定背景下个体的生活与心理状态。这场疫情作为 21 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创伤性事件，对人、会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难以磨灭的，法国学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一次访谈中讨论了新冠疫情下人类的心理状况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动，因此考察疫情这一创伤性事件之后的文学书写态势不仅对文学中新理论的生成有着某种借鉴作用，也同时具有人类学的价值。

韩伟老师指出，论文题目的设置一定要符合学理逻辑，对创伤理论的运用不能浮于表面，而要从中提炼重点的思想和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样，学术研究才能继续向前拓展。

三、创伤理论视野下的文学书写

《创伤理论视阈下〈战地情书〉解读》

陈若冰

比较文学专业陈若冰同学分享的题目是《创伤理论视阈下〈战地情书〉解读》，她立足于创伤理论，通过小说《战地情歌》中家庭之伤、战争之伤与爱情之伤对以丽兹、摩根等代表者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进行创伤修复，迎来精神回归的故事来解读分析。首先她向我们介绍到创伤理论的概念及发展阶段，即创伤理论是弗洛伊德早期理论研究的核心，创伤指某些人对突发性或灾难性事件的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该理论在 20 世纪末被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19 世纪末的是创伤理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但在此时的心理创伤研究之中，文学还未能进入其视野之中。20 世纪 80 年代，创伤研究从心理学研究领域，从“围绕性别、种族和战争创伤的公共政治话语，转到大学的历史、文学、哲学、文化研究、批评理论等人文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创伤研究成为了一项热门研究。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决定了研究者从只关注受创者的创伤类型和症状转移到把不同的创伤受害者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将他们的创伤与社会政治期待、文化心理和文学研究等联系在一起。

其次分享了《战地情书》这部小说的故事梗概：丽兹和未婚夫道尔顿发生争吵之后遇到了孤独的军人摩根，互相涌现好感。但贝蒂也对摩根产生兴趣，同时，朱莉亚也沉浸在爱情纠葛中。随着战争结束，三位女主人公也都面临新的选择。接下来陈若冰同学重点运用精神分析学中的创伤理论，解读四位主要人物内心创伤的产生原因，并分析其创伤修复过程。首先可以通过人物的创伤症候来理解弗洛伊德和卡鲁斯对创伤心理机制特征的分析，即重复、延宕和潜伏期，比如丽兹挥之不去的“家庭恐惧”，摩根出现的“过度警觉”，朱莉亚经历的“记忆侵扰”等，克莉斯汀娜·迈克莫瑞对于这些意象的设计，正是利用创伤心理机制的特点，从而起到对主题的烘托作用。其次分析人物对创伤记忆的修复，当创伤事件在文化网络意义中被建构成为文化创伤之后，我们就可以跳出仅限于个人的常民创伤，从而更深刻地看到社会群体所遭受的创伤。但对于克莉斯汀娜·迈克莫瑞的创伤文学而言，建构不是唯一的目的，对文化创伤的反思更能够体现其作为一个作家

的社会责任感。在《战地情书》中，这种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塑造了具有战争创伤的男主人公摩根，摩根的遭遇也是二战中人类群体的遭遇。二是其进行了“直面恐惧”和“探寻出路”两种方式的尝试，试图指引人们走出创伤。

最后陈若冰同学进行了总结：《战地情书》里四个主要人物的创伤事件包括三方面：家庭创伤、战争创伤和情感创伤，这三大创伤经历是丽兹等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即选择和依赖遭遇摧毁的威胁。她们的经历也象征着战后美国人民的集体创伤记忆。创伤对她们的影响在表征上体现为闪回、逃避、内疚、噩梦、混乱和压力。丽兹、摩根强迫性地一遍遍重复回忆，活在过去的迷梦中，延续了创伤的影响。朱莉亚、贝蒂难以解决问题，尤其是对她们以前来说很容易的事情，变得迷失方向、焦虑，对爱情感到困惑。而随着丽兹与摩根的通信治愈双方，朱莉亚和贝蒂也在找寻中重建自我，实现了和解与解脱。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创伤修复经历富有借鉴性，即创伤的修复需要外部联系和自我表达。

王敏老师指出，陈若冰讲到创伤和疗愈，新的理论运用于作品评论时，建议多和艺术形式表达、作家创作写作意图等内在的文学特征相结合，从而增强创伤理论的文学批评力量。

《退守、见证与复原：阿来〈云中记〉的创伤书写》

吴甜

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吴甜分享题目是《退守、见证与复原：阿来〈云中记〉的创伤书写》，她从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创伤复原三个方面讨论了《云中记》。

《云中记》讲述的是作为云中村祭师的阿巴，在五年后重返遭受灾难的云中村安抚亡灵与鬼魂，最终与云中村一起陨灭。2008年大地震给当时的中国人造成了巨大心理创伤，阿来作为当时灾难的亲历者，对灾后个体和集体的创伤心理进行了很大的关注。阿来在《云中记》中以一种庄严的态度对这些创伤进行了书写。首先，阿巴这一人物形象可以视作为个体创伤的退守。阿巴无疑是灾后受到创伤影响最大的幸存者之一。《云中记》中当阿巴五年后从移民村返回云中村为死去的亡灵与鬼魂进行安抚时，阿巴感受到的是比创伤事件发生时更强烈的痛苦。

“当时，死的人太多。他们都没有感到太多的痛楚。但现在，就像一把刀割在肉上，他的心头横过一道清晰的痛楚。痛楚来得那么快，犹如一道闪电。去得却那么慢，仿佛一条还未羽化成蝶的毛毛虫在蠕蠕而动。”这种延迟性的创伤体验带给阿巴更大的痛楚。弗洛伊德认为“创伤性事件的影响恰恰在于它的延迟性，在于它对简单定位的拒绝，在于它在任何单一地点或时间的边界之外持续出现。”这种创伤的延迟性体验最先在个人的创伤中体现出来。同样，创伤的病例也不能

由事件本身来定义的，因为“事件本身可能是灾难的，也可能不是灾难性的，也不会对每个人造成同样的伤害。”作为个体，在灾难事件发生时以及发生后产生的创伤程度因个体而不同。作为云中村人，在灾难发生之后，人们带着对云中村和灾难中遇难家人的挂念前往移民村开启新的生活。表面上，人们似乎遗忘了这些经历，但每一户人家住的青瓦白墙安稳生活的背后隐含的是一种被压抑的遗忘。当阿巴准备返回云中村对亡灵和鬼魂进行安抚时，阿巴一户一户一家一家收集东西捐给“那里的人”时，这些幸存者的创伤记忆再次被打开，他们的痛苦在阿巴面前表现出来。虽然在创伤事件的这种潜伏期里，经历者会因创伤的不可言说性而选择短暂的自我麻痹与遗忘，但是当创伤性事件再次被提及，就会产生强烈的痛苦与影响。而阿巴作为云中村的祭师，在移民村生活五年之后返回云中村最后选择与云中村一起消失，没有选择与其他幸存者一样继续留在移民村生活。那是因为对于云中村所遭受的灾难而言，阿巴感受到的创伤对个体而言是较为强烈的。阿巴始终留恋着云中村，留恋着这里逝去的人们，始终担心那些逝去的亡灵与鬼魂得不到安息。阿巴这些创伤都是来自鬼魂的无法安息，但是这些鬼魂并不是真实地存在于世界中，甚至连阿巴自己都对鬼魂的存在与否产生质疑。实质上，这些鬼魂都是阿巴在创伤得不到抚平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真正地对阿巴进行纠缠得不是鬼魂，是阿巴心理抹不去的震后创伤。而阿来也在阿巴身上赋予了双的象征含义，阿巴身上经历着的是灾难与历史的双重创伤。阿巴的经历和行动就形成了一个隐喻：亡魂实际上即是历史，而这个历史一度被遮蔽与忽视，外在于主流的文化、习俗、认识、心灵与情感，这同样是一种创伤，阿巴的返乡即返回到原初历史与创伤现场，只有在返中通过仪式般的再次经历，才能彻底消弭治愈它。”因此，当阿巴回到云中村为这些灵魂进行安抚时，阿巴的内心也开始找到一种平和，直到最后阿巴与云中村一起消失时，他的内心才得到真正的治愈。阿巴的行为似乎是一首“安魂曲”，为了使幸存的人得到安慰，同时自己也得到治愈。阿来有关这一创伤知识“通过象征手段增强了知识，但是其现实主义和象征性模式却始终处于一种隐而不现的张力状态”，产生的是一种属于阿来自己的认识方式。

“云中村”作为集体创伤的见证，是现实汶川地震移置于文学的表征空间。中村的人们都携带着一种来自地震灾难的集体性创伤。个体的创伤因个体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但集体创伤是一个个体创伤的集合体，集体创伤对于个人而言更具有有一种庄严感，更容易造成一种悲壮感，当云中村最后因为滑坡体成了一股由泥土和岩石组成的凝固的巨流消失时，人们哭声四起。中祥巴和央金也在云中村的消失中得到了道德的升华。阿来在谈到自己创作《云中记》的目的时说，“这次地震，很多城镇村庄劫后生，也有城镇与村庄，和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

失。我想写这种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不止是沉溺于凄凉的悲悼，而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云中村的人们对于云中村发生的一切都不会遗忘，云中村的所有人都是创伤事件的见证者。这些见证者是集体的见证。云中村人在云中村存在时见证了地震带来的灾难，同时也见证了云中村最后的陨灭事件。这邪恶灾难的见证不仅来自于个体，更来自于群体。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事件的返回是固执和违背幸存者意愿的。”作为幸存者之一的央金不愿意回到灾难事件的发生地，只是因为经纪公司的协议而选择回去面对，但当央金站在云中村门口的时候，她心里的防线已经开始突破了。幸存者对创伤事件的“失忆”是有原因的。在遗忘的背后，隐含的是幸存者对现有社会生活无法完全融入的痛苦。云中村的一个姑娘灾后搬迁到移民村后，每天在十公里之外的刺绣坊上班，但是在为顾客定制的衣服上将梅花绣成吉祥莲花。阿巴虽然在家具厂拿着收入丰厚的工资，但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阿来想借这些幸存者群体的生活状态来说明，受到时间的创伤影响的个体以及集体感如何融入新的生活以及融入新的生活的种种阻力，这些阻力的来源都是灾后的创伤引起的。对于那些遭受创伤的人来说，不仅事件的时刻是创伤性的，而且走出它也是创伤性的；换句话说，生存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危机。”这也显示了创伤与生存之间的关系。当创伤性事件以个体或者集体的见证存在时，对于遭受创伤的人来说他的生存本来就是一层创伤，也是受创伤影响所经历的一种与他人、与社会的个体的、集体的孤立。在《云中记》中，移民村的本地人对云中村人的称呼永远是“老乡”，而“老乡”在云中村的人看来是对外来人的称呼。对于遭受创伤的幸存者来说，灾难所留下的创伤或许会被短暂的精神逃避所遗忘，但是作为创伤的见证者的集体来说，这种创伤很难治愈，也很难被遗忘。当然，这些阻力背后隐含的是两种不同文化生活的碰撞，是阿来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进行的思考。

哈特曼认为：“文学的言辞表达仍然是使创伤得以感知、使沉默得以听见的基础。”《云中记》是一部以巨大的灾难为背景的小说，阿来对于《云中记》的创作并没有在地震发生之后就开始创作进行，因为阿来担心一味地写灾难让自己有灾民心态。最后阿来选择在汶川地震十周年时以一种颂歌的方式来写。阿来说他“基于一种强烈的情感需要，不愿意一个个生命随着肉体的陨灭就失去全部意义。”写完《云中记》之后，他“心中埋伏十年的创痛得到了一些抚慰。”而且“这个年复一年压在心头的沉重记忆，终于找到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了光芒。至少，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不会再像以往那么频繁地展开关于灾难的回忆了。”也就是说阿来在《云中记》的写作过程中自身的治愈了自己的灾难创伤，这种创伤的治愈方式是以创伤书写的形式进行的。德瑞·劳和朱迪斯·郝曼认为“创伤不能独自面对，只有在关系中才有康复的可能。”也就是说“在一个灾难性的时

代，创伤本身可能提供了文化之间的联系：不是作为对他人过去的简单理解，而是——在当代历史的创伤内部——作为这样一种倾听的能力，通过我们已经展开的从自身的离开来倾听。”当云中村的人搬迁到移民村时，在于移民村人的交流过程中，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转变，创伤似乎也得到缓减。阿巴也在与博士的交流中得到了理解，使阿巴在与云中村一起陨灭之前得到一丝安慰。博士对于阿巴来说，是一位同情者，也是一位聆听者。书写创伤也是治愈创伤的一种方式。阿来作为当时灾难的见证者，灾难的创伤一直能不能平复，《云中记》的书写为阿来“提供了一个塑造自我、建构意识形态主体以及重新评价过去的平台，它能够帮助创伤经历者缓减症状，最终治愈创伤。”在这一写作的过程中，阿来的创伤情绪通过书写宣泄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对创伤有一定的治疗效果。阿来《云中记》的书写使得创伤得到平复，对阿来而言，《云中记》是一种治疗的文学。同时，这种创伤也来自于阿来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焦虑——云中村的消失。阿来对大地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阿来认为“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民无处可去”。在《云中记》中，面对来自大自然的灾难，阿来的态度具有深切的反思性，反思人类，痛惜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创伤性的影响淡化了，以一种超越简单灾难书写的叙述来进行阿来自己的灾难书写，有着很强的文学的现实精神，对于文学的创伤书写也有着借鉴和创新的意义。阿来在创作《云中记》时以阿巴返回云中村的时间为线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云中村的亡灵与鬼魂逐渐得到安慰的同时也是阿巴以及阿来得到心灵平静的时刻。阿巴听到村长说自己身上没有一点云中村的味道，这时阿巴决定返回云中村的这一做法也是阿来自己对受灾同胞的牵挂与痛惜。阿来对大地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阿来认为“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地理，并非与人为敌。大地震动，人民蒙难，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民无处可去”。在《云中记》中，面对来自大自然的灾难，阿来的态度具有深切的反思性，反思人类，痛惜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创伤性的影响淡化了，以一种超越简单灾难书写的叙述来进行阿来自己的灾难书写，有着很强的文学的现实精神，对于文学的创伤书写也有着借鉴和创新的意义。

王敏老师认为，《云中记》用创伤理论很合适，但是最终需要落到类似于民族文化内涵这样的层面。建议不要只用一种理论来分析文本，容易导致模式化。应充分考虑作家创作的思想内涵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地方，用多种理论结合思考。另外，标题是论文观点集中的凝练，最后一个标题相对前面两个标题稍显模糊，应联系着“到底要复原什么？”更加具体就能分析的更加深入。19级汉语言文学潘藤月同学提问：祭司、鬼的消亡类似于《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对于历史超现实的元素的加入是否是对记忆层面而不是现实层面的书写？王老师认

为这一问题关涉文学的功能和价值，吴甜回应说，祭祀和民间传统表现了阿来对传统文化的坚守。阿来是以这种形式进行书写，用文字的形式将藏族文化保存，顺便书写意义。

《创伤、经历与言说：〈被掩埋的巨人〉中的创伤书写》

高颖

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高颖同学发言题目是《创伤、经历与言说：〈被掩埋的巨人〉中的创伤书写》，她指出创伤有三个心理机制：1. 重复：“发生在创伤神经症里的梦具有重复的特征，将病人再次带入他遭遇的境况中，这种情景使他在又一次的恐惧中醒来。”2. 延宕：事件在当时没有被充分吸收或体验，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延迟之后事件的返回“孵化期”。3. 潜伏期：经历了事故或某种暴力事件之后，虽然创伤患者当时感到震惊，但创伤的后果随着时间推移才开始展示；正是因为“潜伏期”解释了历史经历特殊的时间结构和延迟性；只有经过潜伏期，创伤才会发生。创伤与幸存者的复杂关系是幸存者有意回避与忘却，创伤是一段未被认领、不被承认的经验。

关于《被掩埋的巨人》中的创伤书写，高颖重点分析了书中的一个创伤隐喻：呼出迷雾的母龙。它一方面代表强权统治下人们的被迫遗忘，另一方面代表人们自身防御机制的主动忘却。书中的创伤症状是创伤记忆不断闪回；小孩的尸体；修道院的尸体；埃德温出现幻觉、麻木的征兆。抚慰创伤的方法就是杀死母龙。她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关乎国家、种族、人类的集体创伤应该如何完成疗愈？

最后一部分谈论了奥斯维辛之后如何写诗？二战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恐惧中，大屠杀带来的种族悲剧、冷战带来的虚假和平和恐怖主义的涌现。那么国家和社会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仇恨与复仇的意志一直存在，只不过被隐藏了而已。每个国家都存在被掩埋的巨人。

王敏老师指出，高颖同学的对象是个石黑一雄，他的身份是复杂的，他是英国长大，但是有日本人的血脉，他在40多岁的时候参加纳粹的集中营，之后就产生了深深的关于这种记忆，关于自己身上携带的这种种族记忆，如果你能够将他在这个作家，把他的身份、创作动机以及表述方式，还有世界文学观点，把这些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就更加具有问题。赵周宽老师指出，理论的回忆需要有，关于作品的更深的分析也要有，高颖对于石黑一雄的作品的回忆理论的分析，她是注意到把关于超越个人、超越特定时代的创伤，拓展成为一个关乎民族、关乎国家的一种书写。这个问题只是提出来，没有展开，但是石黑一雄的作品能不能提供更加具有普遍性的一个问题，这有待于从两个方面深化，一个就是关于理论

本身的深化研究，另外就是更加深入的去阅读石黑一雄的其他作品，以及围绕石黑一雄的生平以及他的整个生活环境，所形成的一个关于整体的文化记忆的这样一些链条，或者是个体来引申到关于国家的，民族的，或者人类的这个层面，也是非常好的。

《读凯西·卡鲁斯〈创伤、经历与言说〉兼谈谈恩美小说中的创伤叙事》

党彬彬

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党彬彬发言的题目是《读凯西·卡鲁斯〈创伤、经历与言说〉兼谈谈恩美小说中的创伤叙事》，她首先指出，心理创伤引起学者和相关人士的关注，是从越南战争（1955-1975）回国后退伍的老兵，虽然他们的生活已经恢复了平静，可是他们的体验好象每天总是在战场上一样，不断地会闪现战争的画面，死去战友，杀戮的场面，枪声喊声等等。睡眠紊乱，情绪非常不稳定，对生活没有快乐感，每天生活在过去的回忆中，而且是片段性，零碎的。后来对这些退伍的老兵进行心理干预，并提出一个诊断名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接着，她对创伤话语的流变进行了梳理：17-19世纪中期之前，创伤及其相关概念都围绕“物理伤口”做出解释；19世纪后期，创伤从身体转移到心理（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19世纪-20世纪，欧洲涌现“神经症创伤话语”（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的个体病理现象）；20世纪中后期，越南战争（1955-1975）使得创伤话语大面积涌现并进入公共空间。

卡鲁斯《不被承认的经验：创伤、叙述与历史》核心观点：发生时未能充分吸纳进时间序列中，创伤有着内在的延迟性，其灾难性后果总是延迟的、以强迫复的形式展开——因为心灵总是试图回溯性地将创伤吸纳进时间序列。因为内外边界的崩溃，外部刺激直接写入心灵，所以在创伤情形中，直白性与不可进入性（无法直接指称）并存。卡鲁斯《创伤、经历与言说》指出了创伤性历史的指称困境：“事实上，创伤性经历的这一真相构成了其病理或症状的中心，也就是说，它不是意义虚假或意义置换的病理，而是历史本身的病理。我们可以说，受创者在其内心中携带着一段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受创者自身成为他们不能完全占据的历史的症状。”除此之外，卡鲁斯还认为，提供一种言说的可能性，尚未被理解之物的位点。传达危机与生存之关系在精神分析的思考中心性。

创伤研究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意味着什么？卡鲁斯指出，弗洛伊德求诸文学来描述创伤经验，是因为文学就像精神分析，关心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的复杂关系。创伤的文学书写包括家庭创伤、历史创伤、个体创伤。谭恩美的创伤写作：创

伤主题：包含不和谐的母女关系、代际传递的家庭羁绊、充斥封建强权及暴力的、家庭与婚姻、战争之中的家园失落、华裔群体的心理创伤。

创伤叙事：难以言说与重复讲述状态；幻觉、鬼魂、与死者的会见；特殊的时间结构；过去对现在的侵袭和边界的模糊；自传性情节设置；贯穿多部小说的创伤叙事。创伤个体的生命韧性：受创个体在与生存、环境、命运等因素进行不屈斗争的过程，彰显出个体生命的韧性与光辉。创伤民族的历史建构：追溯民族苦难历史与书写集体创伤记忆，突破创伤不可言说的困境，实现民族身份重建。

创伤写作意义是彰显人文关怀：在反复经历的过程中将创伤体验内化为自我经验，达到创伤的疗愈；作为间接指涉历史的叙事作品，不仅能为读者抵达创伤历史与记忆提供途径，也能在重复创伤体验的历史叙事中帮助个体及族裔集体记忆创伤、疗愈创伤。因此“创伤写作”可作为创伤宣泄与创伤治愈的最佳途径之一。

王敏老师点评时指出，用一个理论解读一个作家浮现的面貌似曾相识，创伤不应是唯一的角度，应进一步思考修辞的方法——表现出什么样貌，与作者身份有何关联。建议与后殖民主义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一起思考，建立自己的理论逻辑框架。

《〈鼠疫〉中的见证艺术》

李晨希

比较文学专业李晨希同学发言题目是《〈鼠疫〉中的见证艺术》。她首先讨论了创伤再现与文学表达之间的关系。自然主义创伤理论将创伤归于某个自然发生的事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的文化创伤理论，认为事件只有置于特定的系统中才能被解释为创伤，一个社会事件或者灾难无法自动地成为文化创伤记忆，意义比事件本身更重要。文化创伤不只是个人，更涉及到群体的认同，甚至是全人类共同的受难经验。要将个人的创伤记忆加强成为集体记忆，就需要创伤见证的过程，言说者在特定的语境下通过各种形式将创伤记忆传递给公众对象时，就形成了见证文学。拉卡普拉认为：与事件的距离过近或过远都无法复现创伤事件，学界也对创伤再现时选择语言的写实还是修辞意义进行了争论。贝雷尔·兰是写实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像奥斯维辛这样的事件只能使用写实的语言再现，认为修辞语言代表的是虚假历史。他赞成在书写中使用没有距离的直接表达方式，就像犹太幸存者证词一样讲述自己亲历的事件。但是通过写实的手法见证大屠杀这种事件是有难度的，首先是这一事件本身具有不可能性，已经超出了道德和伦理底线，是施暴者都觉得只能做不能说的行为，留下“最终解决方案”这样的

间接表达，表明他们有意保持这一行动的隐秘性。在《声音的返回》中有指出，《浩劫》中出现了三类证人，加害者、旁观者和受害者，他们的视角都具有局限性，纳粹通过焚烧尸体消除证据，抹除见证者的存在，甚至参与者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确切含义，这样三种人都成为了不能见证的证人，作证取决于共同体的存续以及与之相伴的法律惯例，不同的目击者之间无法互相印证，导致大屠杀成为了一个无证事件。这种目击的分裂以及证人有意或无意地做出伪证，使见证叙事陷入了罗生门，不同立场的证词产生了对抗，见证陷入了一种逻辑学循环。证词的相互对抗可能是源于创伤事件对于记忆的摧毁，这种摧毁对于加害者和受害者来说具有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加害者的沉默是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再被提起，例如在电影中，死亡列车的负责人声称自己因为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未看到过前往奥斯维辛的火车，甚至第一时间想不起来集中营的名字，把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称为新闻。这种指令性遗忘对加害者来说是遗忘耻辱和罪行的一种特赦，对受害者则是一种抹除，将他们从历史书写、社会记忆中清除。对于受害者来说，他们的沉默导致了证词的不可能性。在经历巨大创伤后，这种遭遇超出了个人的理解，不在经验的范围内，所以幸存者尽管活了下来，精神却已经死去，丧失了部分或全部叙事能力。由于创伤事件本身的影响是延后的，本身来讲，事件发生的时间、书写和阅读的时间是三种不同的时间，对创伤的再现都是在灾难结束以后才形成的，这个时候书写者的记忆里已经混杂了其他的经验，所以创伤书写必然包含了受害者的新编辑和想象。

《鼠疫》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如果严格依据概念来判定，可能并不属于见证文学，因为这是一个寓言，写的是奥兰城的人在里厄医生的带领下抗击鼠疫的故事，将鼠疫视为大屠杀的隐喻已成为学界共识，书的题词引用了英国作家笛福的话，这样背景就模糊化了，这一灾难可以指代任何一种灾难，作者本人的言论也直接证明了这一隐喻。在文本中也有着相对应的体现。

费尔曼认为，创伤叙事中的象征与历史的见证直接相关，在《见证的危机》中解读这一隐喻表达时，她指出加缪认识到了再现缺乏指涉事件的局限性，在历史指涉的场所选择了隐喻，指明了一个隐喻的替代事件，指出了一个历史上的不可能事件。《鼠疫》在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构建起一种以象征为介质的隐性互文关系，反映了历史与叙述的关系的转变，不仅是为了记录，也是为了从新的视重理解和思考大屠杀，并实质性地改造历史。《鼠疫》不论从内在逻辑还是叙述形态上来讲，都具有明显的见证的特征，文本使用的是新闻报导的编年史形式，用第三人称形式写第一人称叙事，记录真人真事。像是大屠杀这样的历史概念，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上的、统计学意义上的，通过文学见证是一种“肉身化的历史见证”，可以看到个体在灾难中的存在。

文中的见证者有两个，朗贝尔作为记者，他的见证是指称性的，里厄医生的见证也是作者的见证，才是真正的历史见证，是文学把见证从想象力的历史性失败中解放了出来。朗贝尔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角色，他的转变也可以从见证的角度去分析，一开始他认为自己不是本地人，在城市封闭后一直在想方设法离开，到后期他也投身于抗疫工作当中，选择成为受害人，这样就主动获得了证人的身份和资格。这种转变见证的是我们如何一步步被纳入历史中成为无法割裂的一部分。加缪在书写的过程中选择的是里厄医生作为见证人，也通过他的叙述指出一点，见证的资格必须建立在亲历甚至理解的基础之上，因为他的职业是医生，所以有机会接触到大 的居民，因此才有资格叙述他的所见所闻。里厄医生既是主人公，也是叙述人，就像前面说的，这是一种第三人称形式写第一人称叙事，是一种互为制约的方法，第一人称限制了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使得见证具有个体意识和真实性，使叙述保持一种谨慎，避免叙述里厄医生没有亲历的事件，也避免对事情做没有根据的推断；第三人称又限制了第一人称的心理、情感的表达，让事件变得更加客观。

韩伟老师点评中指出，李晨希同学对已有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应该多一些自己的思考，研究本身要具有生长性，需要增进，体现研究的价值。

《疗救、见证和建构——电视剧〈人世间〉的三重创伤》

蔡洁纯

2020 级现当代文学的蔡洁纯同学分享的题目是《疗救、见证和建构——电视剧〈人世间〉的三重创伤》，她通过电视剧《人世间》中个体创伤、集体创伤和时代创伤，层层递进来解读分析。

在第一部分疗救——直面个体创伤中她分别举例身体症候、心理症候和事后性特征来分析。身体症候中最常表现出的就是“受暴”，当代学者陶家俊在《暴力》一文中指出：“创伤源于现代性暴力，是现代文明暴力本质的征兆”。暴力造成的创伤，暴力造成的痛苦，都潜在地压抑着受害者，让他无法说出自己的声音。心理症候留给人们的是再现，即即使个体面临的危险已经过去，人物主体还是会不断地想起创伤事件，这个创伤事件发生的场景反复地出现在人物主体的脑海里，因为“创伤具有一种萦绕不去的品质，通过不断的重复和返回持续占有主体，”。创作者采用闪回镜头来表现他们创伤的来源，创伤记忆的重复再现。事后性特性表现为“噩梦”，在创伤综合症诊断标准里，创伤后遗症中有幻觉、梦境、闪回以及心理与生理的各种反常症状。这些症状可以在创伤事件后或短或长

的时间里表征出来，即是受创者的创伤事后性特征。但是尽量这样，电视剧中的创伤叙事，意义在于让人们从叙事中找到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方向，在创伤叙事中，学会应对生活中的苦难，找到解决创伤的方法，获得疗救，自我救赎，“让人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依据，通过叙事教人成为自己”

第二部分见证——集体创伤记忆中，蔡洁纯同学用电视情节来着重分析在经历“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物质及其贫乏，人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对于下乡的知青集体来说更是如此，对于食物的渴望，让他们产生了饥饿症候以及《人世间》中的六小君子最开始都是开心快乐充满希望的，他们有着质朴的友谊，过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日子。但是随着个人的发展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六小君子从最初的无话不说到逐渐心有隔阂。包括在电视剧《人世间》中，返乡后知青表现出来的隔膜心理症候，重要原因在于“文革”话语的统筹下，不仅造成了当时个人正常生活的紊乱，还造成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距离。曾经给他们的伤害成为了永久性的创伤。这些身体、心理以及事后形成的创伤见证了集体的记忆，知青们作为这场运动的主人公，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他们所拥有的创伤记忆，不能因为政治原因而被忘记，也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人世间》中的集体创伤给众多知青们一个回忆过去，反思历史的机会，填补了对集体记忆的遗忘，成为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第三部分的建构——悲剧时代的创伤，承接第一二部分，将个体和集体都放在时代背景中，揭露电视剧《人世间》中所体现的住房紧缺、就业困难、城乡鸿沟的现实问题，最后得出悲剧能够促使人类意识的觉醒，呼吁社会文明的进步，对个体、国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人世间》及此类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建构了这种悲剧美学价值，承担了一种责任，有助于人们更好更多的理解上山下乡和文草地那段历史，也是对现代生活的借鉴。《人世间》的创伤叙事不仅是针对个体，还是对集体、民族及国家社会的创伤修复，关注人类本身的创伤世界，使创伤叙事成为全世界人们的宝贵财富，这正是对知青题材电视剧创伤叙事研究的价值所在。

读书会的最后，韩伟院长表示，本次读书会的目的是希望同学们以此建构起创伤理论体系，将创伤理论作为方法，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希望各位同学们将汇报的成果继续研究下去，形成扎实的论文，同时注意理清论文的学理逻辑，反思创伤理论本身的局限，形成真正有意义的理论成果。王敏老师指出，同学们对创伤理解的介绍和分析比较全面，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作品，从而更好的理解人的心灵境况，而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将理论知识赋予实践，运用到实际

的文学论文写作之中。赵周宽老师充分肯定了读书会的重要性，并对读书会的举办方式提出了完善建议，希望读书会活动继续为师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和分享平台。

本次读书会圆满结束，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通过 14 名同学的分享，同学们对于创伤理论有了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拓宽了学术视野，丰富了思考路径。同时，汇报者们用创伤理论对于具体文本的分析也为其他同学们提供了思路，同学们表示将会在反思与借鉴中持续打磨自己的分析文本，不断追求进步。

撰稿人：王亦濛、王彩转